

论《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

林锦芳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搭建了以人物对话为形式的历史舞台, 在对话交流中折射出柏拉图在哲学、政治、教育等几大领域的诗学思想。对话的内容之一是对荷马在史诗中创作方式的批评, 从中表现出柏拉图的诗歌态度与诗人态度, 批评主要体现在: 二、三卷中关于护卫者的善育及诗人的创诗歌作、四卷的音乐教育、十卷的模仿问题。梳理柏拉图在这几个部分中的思想可以看出, 关于诗人的创作他形成了一套从创作目的、原则到方式三个方面完整的规定, 在这些规定的背后又有着柏拉图从不同立场出发的目的。经过柏拉图与荷马的对比, 可以看出这种批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二人不同的诗歌态度与人生态度。

关键词: 《理想国》; 柏拉图; 荷马; 诗歌态度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一、批评下的诗歌态度

《理想国》里诗人的创作故事的内容主要是处理三个方面的问题: 对护卫者(故事接受者)的定位、诸神与英雄(故事人物)的形象表现以及诗人自身(故事创作者)的定位, 柏拉图通过对荷马的批评发展起他的诗歌态度,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诗歌创作目的的角度来说, 诗人的创作首先服务于护卫者的教育需要; 从诗歌创作标准方面来说, 诗人创作中的对象则应符合规定的标准; 从创作方式角度而言, 诗人的创作扮演的是“善”的代言人。

(一) 创作目的: 服务于护卫者

在《理想国》当中, 柏拉图说到护卫者的教育问题时, 提出首先应对护卫者进行音乐(故事)教育, 也就是说诗歌对于护卫者而言应是为其服务, 因此就需要审查荷马及其他诗人讲述的故事。护卫者因为具备一些特性, 使得它在诗歌接受中并非单纯作为区别于客体的主体意义而存在, 而是有其更深的内涵, 成为讨论荷马及其他诗人创作的核心要素, 成了柏拉图诗歌态度中重要的参考系数。

首先, 护卫者是在关键位置的动荡条件下的创造性生产, 而非祥和时期复制式的规模扩大再生产。在第二卷当中, 柏拉图和阿德曼妥思借助于城邦的正义来探究个人的正义, 于是他们开始在思想的世界里构建一个城邦, 在这个城邦里不同身份的人的存在受到了人类生存的不同需要的刺激, 他们可视化着需要, 护卫者亦如此。护卫者产生于城邦需要通过战争扩大规模之时, 在此之前城邦里一片祥和, 没有护卫者的存在, 对这类人的管理没有规章制度可循, 并且他们生存的环境经历了城邦秩序的过渡, 在新的时期下对一批新生的人群的管理也就变得复杂, 护卫者被摆放在了诗歌生产的核心位置。诗歌潜移默化的特点让诗歌在柏

拉图眼里成了“不放心人们去听”^①的东西。除此之外，相比于其他身份的人，护卫者的重要性还在于他们需要对抗来自外界的破坏力量，他们对于城邦来说，关系到生死存亡，他们的存在能够维护城邦里生活的正常运转，成为城邦其他部分存在的基础与保障。因此，护卫者对一个扩张之中的城邦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统辖着诗歌创作的其他两个因素。

其次，护卫者拥有庞大的基数及发展对象的潜在性，而不像诸神与诗人在数量及被认知上具有稳定性。在论及护卫者的教育时，柏拉图继而将儿童也囊括进他的教育对象范围内，“为了预防意外，我们应该一开始就给孩子们装上翅膀，必要时让他们可以振翼高飞。”^②从骑马、战斗到赞美诗之类的诗歌，柏拉图认为儿童应该从小就被规定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这样的城邦里，护卫者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战争的发生和城邦的发展需要而流动着，具备了护卫者的德性就有可能成为护卫者。从这一点上来说，柏拉图他看到了护卫者的培养与发展问题的长远性而倍加关注。再加之，人的德性不如诸神稳定，让护卫者能够在守城的岗位上保持技能的稳定对城邦的发展来说就有了长远的战略意义。相比较而言，诸神属于既定的存在对象，在普通认可的社会认知结构下，他们的符号意义及世俗化的理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神的形象意义可以像约定俗成的习俗一样被固定下来。柏拉图理解下的诗歌创作的三大因素中，护卫者是最不稳定的一个，柏拉图的讨论也因此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结合护卫者的这两个特殊性，诗人创作应服务于护卫者的教育需要，而诗人在柏拉图看来，“是未经审视的无效知识的主要集聚和传授者”，因此就有必要具体地从诗歌创作的内容到形式对荷马提出了详细的批评修订。

（二）创作标准：诸神与英雄稳定的形象特征

荷马在史诗里的主要人物是神与英雄，柏拉图将这两者作为对护卫者的教育素材，以实现教育目的，但是在被应用之中，这些素材就像已经定型了一样，不以诗人意志为转移，从利于接受者的善出发保持善的形式直接抵达诗人的艺术作品里，具有单向的创造性，这里体现出柏拉图神性的创作论，其中神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神的本性是善的，并且是一切善的事物的原因。针对这一点，他对荷马在史诗中将神描写成恶的部分不留余力的加以批评，他指出“必须痛加谴责，是丑恶的假故事”。^③他认为“一个人没有能用言辞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来，就等于一个画家没有画出他所要画的对象来。”^④在这一句话里，柏拉图既指出艺术家创作应遵循神的本性，同时还指出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他们的创作都应是有目的的，在柏拉图那个时期，这种目的是对国家统治需要的回应，而不是主观的发挥，诗歌里“不该让年轻人听到诸神之

^①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5页

^②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8页

^③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2页

^④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2页

间明证暗斗的故事，”^①如雅典娜与阿芙洛狄忒、阿波罗之间的争斗。因此，他反对那些违背他从善的理想出发神所应具备的本性的艺术创作，为艺术创作设定了禁区，艺术家只能是神的善的本性的再现。

其次，神的德性是稳定的。柏拉图认为“神和人都尽善尽美，永远停留在自己单一的既定形式之中。”^②因此，他反对艺术家随意更改神的形式，他也不许荷马在诗中这样描述“神祇会幻变各种形貌，变作生客从远方来到，巡走城市，探察哪些人守法，哪些人残暴。”^③他试图在神保持本性善的同时保持它的单一性，试图将神本来的面目以最简单的方式出现在护卫者的面前，结合他关于每个人都有一项自己擅长的技艺论述，可以推理对于护卫者来说，善恶的判断对于他们或许并不那么擅长，如果艺术家任意改变神的形式，那么这将会造成护卫者接受的混乱，甚至会影响他们护城的技艺的发挥。

对诸神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柏拉图为神创造一个可被感知却又不可随意更改的世界，试图让它成为护卫者及诗人、公民勇敢生活的精神动力，要求诗歌构建起一个善的世界。古希腊作为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与神共同承载着美的世界，因此在诸神之外，英雄在柏拉图那里也是有一些本质性的特征，他与诸神共同执行着引导公民的教育工作。

一方面，英雄是勇敢的，表现为不畏惧死亡，因此他主张应该将史诗中描写英雄畏惧死亡、嚎啕痛哭以及挽歌所删除掉。删除掉《荷马史诗》里对阿基琉斯长号大哭的描写，如“阿基琉斯和帕特克洛斯的女仆们，心痛、悲伤，哭叫着冲出棚房。”^④删除特洛伊老王哀嚎儿子的描写。在柏拉图看来，这些所谓的人们喜欢听的好诗，迎合的是某些应该受到限制的趣味，而不是站在一个城邦的统治需要的角度，在此也可以看出，需求在柏拉图的世界里并不是同一的，而是有主次高低之分。同时，联系柏拉图讨论人的灵魂三个部分的相关章节，可以知道激情在人的灵魂里是最难以区分以及控制的，对英雄上述的描述恰恰容易引起护卫者以及公民的激情，使得灵魂变得动荡，让整个城邦的情绪与精神进入难以管理的混乱状态，这和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英雄是自制的，表现为不享乐、庸俗不堪、无礼犯上、不贪财恋色，因此在艺术中的英雄不可被蔑视。英雄与诸神相比较而言，与公民的距离更近，通过对英雄的这些规定，让它们成为护卫者日常生活中所能凝视的对象，获取英雄身上好的品性。这样具体化的要求使得英雄的精神力量更易于将它们渗透进护卫者的灵魂里，让它们分享有英雄的无畏与自制。

通过批评荷马柏拉图明确了诗歌创作的标准，柏拉图更多的是从接受的角度来论述，在还原诸神与英雄的本质的同时，为了将善赐予给护卫者以及公民，在内容的选取上它们只能遵循善的轨迹，单向的为诗人所应用。

^①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3页

^②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8页

^③ 荷马著，陈中梅译注：《奥德赛》，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72页

^④ 荷马著，陈中梅译注：《伊利亚特》，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

（三）创作的方式：作为善的代言人

柏拉图对诗人的审查包括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是西方叙事学研究的一部分。“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①可以看出柏拉图的诗歌态度始终围绕着他的为善的理念，所谓的善，学史上有的学者联系柏拉图其他的著作，认为善可以理解为“由心灵‘奴斯’”所创造的‘秩序体’”，^②为了创造这个秩序体，护卫者的善表现在利用得天独厚的护城技能让城邦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诸神的善在于它作为稳定的善教化着公民。诗人则以善的代言人身份延伸了教善与扬善，巩固着护卫者的善的心灵，这是柏拉图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对诗人创作的规定。

从形式上来说，否定复杂的模仿，推崇单纯善的模仿。柏拉图认为诗歌主要有两种体裁：模仿与叙述。模仿完全除去了诗人在对话之间加入的部分，模仿让诗人成为模仿者，“所谓各自模仿只不过是事物本身的摹本而已。”^③在柏拉图看来，“诗撇开了认知始于事物的一般常识，以诗人的痴迷‘锁联’听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排拒思考和识辨的认知模式。”^④在撇开常识下诗对英雄的模仿是无法符合事物的真实本质，作为摹本拉开了公民与真实的距离，听众被锁联后无法形成对英雄代表的真理的认识模式。除此之外，柏拉图在人的问题上，他的主张每个人只有在专心发展一项技能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具备这项技能，城邦就会因为大家的各司其职而稳定，因此，在诗人的创作问题上，在模仿与叙述的选择上，他在第三卷中的态度是拒绝模仿，即使需要模范，也只能是单纯善的模仿，也就间接否定了荷马利用模仿所创作的史诗，因为善在柏拉图看来，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对公民的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对善的不同角度的阐释而已。

单纯善的模仿中，诗人模仿的必须是与护卫者有正当关系的人物，他们勇敢、节制、虔诚、自由。通过模仿这些人，让公民模仿“坚定而明于事理时候的言谈行动”^⑤与其说诗人模仿这一类人，不如是善的理念借助诗人来接近护卫者，柏拉图出于对护卫者的特殊关注，总是力图帮助他们过滤所有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东西，从对象到方式，他在肯定以及否定的推理中逐步的逼近护卫者的心灵。

柏拉图对诗歌的创作态度以护卫者为创作目的和核心对象，遵循护卫者的发展特性确定诗人的创作标准与方式，以荷马的史诗为例，在不断的矫正下，就像对《荷马史诗》的再版一样，既挖掘出史诗里能够被护卫者所接受的部分，又以柏拉图的政治蓝图对史诗量身定做了一套修改方案，让荷马的史诗以修改后的模式为护卫者搭建起与城邦发展需要相符合的精神城墙。

二、批评的立场

柏拉图在谈论诗歌问题时，针对诗歌服务对象、创作对象以及方式这三个问题，他既

^①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2页

^② 王宏文、宋洁人著.《柏拉图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③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0页

^④ 陈中梅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

^⑤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7页

从创作的目的出发统一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可以从中分别看出柏拉图的三种立场，这三种立场就像是并驾齐驱的三匹马，共同形成了在《理想国》中所表现出来的柏拉图形象，分别是作为城邦缔造者的立场、神法的护卫者立场以及艺术审查者的立场，从而丰富了柏拉图的理想，感受到柏拉图对荷马的诗歌创作的批评里蕴含着他从集体出发的高度的思考，同时也赋予了他对《荷马史诗》三种不同的批评话语下的复杂情感，在否定背后的特殊肯定态度，正如陈中梅所说：“作为一个常常把宗教与文学和历史混为一谈的民族中的一员，柏拉图绝对不能，也不会轻看诗人的‘神功’”。^①

（一）城邦的缔造者：将秩序可视化

一个城邦的发展需要一套秩序来维持，而秩序的产生需要缔造者的探索与编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自己定位在“城邦的缔造者”，从这一角度可以发现，他既是为了解决护卫者的教育问题，从城邦治理的立场上来说，他更是在通过自己的讨论与思考为城邦树立起一套秩序，在人们的践行中，将秩序可视化，建立起城邦长期存在的根基。

城邦的物理空间可以通过疆域的划定来确定，精神空间由于抽象以及自由往往成为城邦治理的难点，所谓国法就是对公民精神空间以明文规定，柏拉图作为城邦的缔造者，他在荷马等诗人的诗歌创作问题发表看法，实际就是在将城邦的精神秩序通过诸神英雄的载体，借助诗人的艺术规约加以可视化。不同于以直接的法律条令来规定公民的方法，柏拉图采取的是在公民耳熟能详的史诗、戏剧等其他艺术中建立他的心灵诗学，通过这样的方法，从接受的角度，将秩序融化在艺术中，将秩序放置于公民的生活之中，减少形式上的阻力，实现他作为城邦缔造者的目标。

对于护卫者来说，诗歌是对城邦秩序的可视化，对于城邦而言，诗歌就是社会的一种表达，它作用于个人，通过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等使得护卫者与城邦成为一体，形成城邦与个人之间能够共享的一种超文本。因而，基于将城邦秩序可视化的这一立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荷马那些不符合一个城邦发展、稳定与繁荣的实际需要的批评，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柏拉图已将荷马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上讨论，在政治伦理下对史诗的修改与调整，为史诗保留了另一个发展空间。

（二）神法的维护者：高尚的灵魂对话

对诸神与英雄的本性描述中，柏拉图将教化的力量赋予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来自于柏拉图的第二种立场，即作为神法的维护者，他要保护神的善的本性，要保证神与人之间是绝对的善的对话。

柏拉图的这个立场一方面来源于古希腊普遍的宗教信仰。在柏拉图的那个时代，无论是史诗还是戏剧中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观念，他们相信宗教对现实是具有福祉符号意义，

^① 陈中梅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页

他们将生活的日常欲求的延伸寄托于宗教，而宗教也能够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加以回应，从《伊利亚特》中战争开始前军队祭祀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从这一角度来看，柏拉图与荷马之间展开的是一场关于宗教使用问题的较量，两者共同关注的都是神，柏拉图世界里的神本性既独立又并非独立的存在，独立在于神的善的本性是稳定的，诗人不能随意改变神的形象，神因有善而使公民敬畏它。不独立在于神的善本性受到了像柏拉图一样的政治家目的的驱使，人与神之间也就没有平等的关系而言。荷马对神更多的是使其在精神上与人保持平等的化用，在他的创作之中神没有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的感觉，他已全然被人性化，与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柏拉图对公民灵魂的态度。柏拉图说“最勇敢、最智慧的心灵是最不容易被任何外界的影响所干扰或改变”，^①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生命物潜在的具有自足完整性，具有如普罗提诺所描述的可理知世界的向上的运动，只要保证灵魂没有受到外界恶的事物的拖累。在这里，柏拉图通过保护公民还没向坏运动的灵魂，让公民与诸神的灵魂进行一场纯善的对话，并不是一味的压榨公民的自由，而是创造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自由，让公民在这种自由里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护卫者所需要的品性。

从试图构建护卫者与诸神之间高尚灵魂对话的这一立场来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荷马的批评与他的崇善的宗教观以及灵魂之间善的对话准则是相符合的，同时也再次将荷马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即人类理想的精神花园的位置上，在那里艺术或许也可以在柏拉图的思想里生根发芽，形成独立的一套体系出来。

（三）艺术的审查者：引向洞穴外

在柏拉图看来“诗人是未经审视的无效知识的主要集聚和传授者”，^②因此他对艺术家们制定了一套从形式、内容，以及调式到节奏等方面的标准，这套标准的最终目的在于让艺术传达出适宜的情感，但是，柏拉图没有因此而否认艺术在公民教育中特有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更符合艺术的审查者身份，既保持艺术的特性又达到他的诗歌教育目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护卫者“从小到大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都会受到影响”，^③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公民的影响是长期性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政治以及宗教目的的影响下而沦为政治宗教的囚徒，它对护卫者来说，只要满足好的艺术的条件，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天性，能够帮助他们形成终身的习惯，结合柏拉图的洞喻，公民由于终日看见洞壁上的影子而误以为影子即为真理，如果说这就是他们的天性，那么公民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接触到洞外之光呢，艺术就是途径之一，在不违背城邦政治以及宗教原理的基础上，艺术是给予护卫者接近真理可能性的方式之一，虽然在柏拉图看来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只是对于护卫者来说，他们的更大责任在于提高护

^①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7页

^② 陈中梅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页

^③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0页

卫的技能。所以，从公民的启发角度来说，柏拉图又给予了他们认识真理的机会。从这一视角来看，柏拉图正是考虑到了艺术在公民教育之外，间接让公民认识真理的这一重要作用，才对荷马以及其他艺术层层深入的剖析，为的是确保艺术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承担起洞穴外之光的引入者这一角色，因此，柏拉图将荷马提高到了真理问题的高度，虽不属于真理，但却在公民与真理关系之中。

因此，从城邦缔造者、神法护卫者和艺术审查者这三个立场来看，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是与他个人的政治、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的追求是相一致的，他力求通过对荷马和其他诗人的创作的管理，消除会使社会产生混乱的可能性。但是，同时也看出柏拉图对和诗歌的复杂态度，他不是一味否定诗歌的价值，而是在否认当中体现出他的一种特殊肯定，诗歌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与教育力量，只是这种肯定需以否认为前提，这两种思想以主次的关系存在。

三、柏拉图与荷马诗歌态度的比较

柏拉图与荷马对于诗歌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柏拉图的这场长篇巨幅的批评，在荷马看来，诗歌的作用是愉悦，是人的意志的彰显。而柏拉图由于特殊的生活时代背景，诗歌成为政教的手段。除此之外，二者对人生与悲剧关系的不同看法也促成了《理想国》里这一精彩的辩论。

（一）诗歌作用：愉悦或政教

古希腊时期诗歌还未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诗歌或表现人们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或记载神和人的业绩，或树立效仿的榜样。

在荷马看来，诗歌的作用是愉悦。诗人通过创作诗歌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享受欢乐，让人暂时忘却痛苦与烦恼，这是早期从艺术审美角度对艺术美的阐释。当然，荷马认为诗歌除了愉悦功能之外，也发挥着教化的作用，只是这些都应是从小悦里衍生出来，因此，在《荷马史诗》里他大胆的扭曲神的形象，描写出英雄不稳定的情感。荷马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生活不稳定的思考，另一方面启蒙人们对生活不同层面的认识，从这一角度而言，荷马丰富了艺术的审美价值，让艺术在审美之中延续它的影响力、生命力。

与荷马不同的，在柏拉图看来，诗歌的作用为政教服务。诗歌在柏拉图身上作为一个矛盾体而存在，柏拉图作为哲学诗人，对于诗歌也有着普通诗人的热爱，在《理想国》里他多处引用不同诗人的诗歌，间接地反映出他的诗歌世界。但是，柏拉图生活在一个城邦衰落、群龙无首的时期，哲学家的使命意识成为他的主导思想，诗歌也就成为政治教化的手段，诗歌如何快感的作用过于强烈，公民的道德就有可能败落，“‘内心的国制’要与‘身外的国制’联系起来”，^①只有“身外的国制”健全了，“内心的国制”才能够朝着幸福的生活进步，

^① 王宏文、宋洁人著.《柏拉图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因此，诗歌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是在政教下的自由。

二者的对诗歌功能有着不同理解，荷马在艺术里播撒愉悦的种子，让人们首先把艺术当做艺术，在欣赏或愉悦之中认识诗歌，认识生命。而柏拉图就像拉了一条缰绳，为政治家的他鞭策着城邦的建立和发展，鞭策着公民的单纯本性的延续。

（二）对悲剧的态度

柏拉图与荷马除了在诗歌功能上有不同认识之外，在悲剧的存在价值上二者也存在分歧，在《理想国》里关于城邦需不需要引进悲剧的部分里，柏拉图模糊的回答里就呼应了他的悲剧观。

柏拉图拒绝会引起恐惧的人生苦痛，苦痛是作为趋善的形式之一。苦难之所以在部分人身上发生，在柏拉图看来“因为他们该受惩罚，神是为了要他们好，才惩罚他们的。”^①解析柏拉图的观点可以发现柏拉图对于人生的苦难或者悲剧是否定的心理。首先，苦难在柏拉图看来有其与自身相关的因果关系。人的每一遭遇都有其先在的原因，就像战场上的战士，灾难降临他们身上是由于他自身存在的瑕疵，当这种苦难得到因果解说的可能，它就不足以引发人们对悲剧的恐惧，对于他构建的城邦的子民们也就不会有畏惧的心理，而是继续保持着勇敢的天性基础。其次，苦难是神加之于人的趋善的方式。面临着苦难，神的惩罚作为改造人的坏的习性，最终目的在于让人们重新接受善，人既不应该畏惧生活中会遭遇的苦难，还不能畏惧于神对人的改造，这样就完全消解了来自外界的消极因素。柏拉图片面地用乐观将城邦包围起来，“摧残情感去片面地发扬理智”，^②禁止苦难悲剧对一个城邦的挑战，因而，《荷马史诗》以及所有诗歌要统一标准，将诗歌化为城邦公民的使命意识。

在荷马看来，苦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苦难会使得众神失色、英雄争吵、民族战乱，这也是史诗里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并非纯粹的要让人绝望，只是通过比较曲折的方式让人们学会抗争，让人们对待人生并非只能听从于神的旨意，发挥个人意志的力量下也能够克服苦难，用悲壮的方式诠释生命，如果说柏拉图是以温室的方式烘焙着护卫者，以激励的方式教育着护卫者，那么荷马就是以还原色生命本质的方式让接受者感受生命的真实路线，感受生命的运动方式。因此，英雄的无节制、哭喊等等，正是建立在荷马对生命的重视的基础上，让接受者从个体的生命意识里萌生出对生命的捍卫，护卫者能够被此所感化，激发出来的教育力量不亚于柏拉图的政教。

《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对荷马及其他诗人的批评中初步形成他的诗歌认识体系，包括创作的目的、标准和方式。进一步分析柏拉图的发言立场，可以感受到柏拉图的批评之中包含着一颗希望通过个人力量拯救岌岌可危的城邦的炙热之心，同时也可以侧面看出柏拉图对于《荷马史诗》有着既否定又肯定的复杂情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复杂的情感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与荷马有着不一样的诗歌功能认识以及悲剧价值观。这就是柏拉图独特的在哲人的

^①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梅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6页

^② 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

世界与诗人的世界里的处世方式。

参考文献

- [1]柏拉图著, 郭斌和, 张竹梅译: 理想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荷马著, 陈中梅译注: 伊利亚特[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3]荷马著, 陈中梅译注: 奥德赛[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4]陈中梅著. 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5]王宏文, 宋洁人著. 柏拉图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 [6]普罗提诺著, 石敏敏译: 九章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7]柏拉图著, 朱光潜译: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Analysis of Plato's criticism of Homer in the Politeia

Lin Jinf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410082,China)

Abstract:In the Politeia, Plato set up a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form of character dialogue, and reflected Plato's poetic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ducation and so on. O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dialogue is the criticism of Homer's way of writing in the epic, which shows Plato's attitude of poetry and poet's attitude. The criticism is mainly reflected in chapter two and three about the good education of defenders and the creation of poems by poets. Four volumes of music education, ten volumes of imitation. By combing Plato's thoughts in these parts, we can see that he has formed a complete set of works from the purpose, principle and way of creation. The stipulation, behind these regulations, also has Plato from the different standpoint the goal.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lato and Homer, we can see that the deep reason of this criticism lies in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poetry and life.

Keywords: the Politeia; Plato;Homer;Poetic attitude